

# 嫋娜、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 ——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 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

陳相因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一、前言：柯倫泰「戀愛三部曲」的寫作背景

從晚清至民國初期，東歐與俄羅斯女豪傑在中國小說中被建構的形象深植人心，風靡一時。這些俄國巾幗，在中國文人筆下往往豔麗不可方物，聰明博學，豪邁勇敢而行事果斷，絲毫不讓鬚眉。對於一些一心嚮往世界大同的中國男性知識分子而言，如此形象益發增添革命的浪漫想像。誠如一九三二年魯迅自承，在「中俄文字之交」的過程中，「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sup>1</sup>，雖然大半也是因為她是一個漂亮的姑娘」<sup>2</sup>。因此，蘇聯著名的革命家與政治家柯倫泰 (A.M.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 夫人，全世界首位曾任部長與外交大使兩種身分的女性，不但在美貌與形象上承繼了蘇菲亞與小說《孽海花》中的夏雅麗，其外交才能與政治手腕則更勝她的前輩們一籌。故當她的著作穿越西伯利亞來到革命中國，

<sup>1</sup> София Львовна Перовская (1853-1881)。蘇菲亞為魯迅及五四一代的中國文人所熟知，泰半因為嶺南羽衣女士所著之〈東歐女豪傑〉，連載於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間一至五號的《新小說》內。巴金亦曾在一九三〇年為其生平作傳，詳見巴金：〈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俄羅斯十女傑》，《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301-339。由魯迅和巴金的敘述可見蘇菲亞從晚清直至民國三〇年代是如何風靡中國、家喻戶曉，其聲名甚至被植入國貨產品名稱內。

<sup>2</sup>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472。

從而對經歷五四運動後的一代青年男女造成極大的轟動，以及在性別想像上的衝擊，也就不令人感到詫異或難以理解。

一九二〇年代中後期至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前，柯倫泰在中國青年、婦女團體，以及國民與共產兩黨內，甚至是對全世界女性／權運動的影響力均不容小覷。正因如此，隨之而來在政治霸權與父權下，有意為之的「一杯水主義」污名化、抹紅／黑與打擊，使得柯氏的先鋒聲名與前衛著作逐漸被迫淡出政壇和文壇。時至今日，在中國與臺灣已鮮有人再提及柯倫泰與其著作。

然而，對照柯氏影響中國五四一代文人及其後的共黨性別政策之深廣，與今日漢學界對柯氏著作研究之貧乏，兩者相較，比例懸殊。英、美與日本斯拉夫學界，以及俄羅斯對柯氏為世界（包括前述這些國家的）婦女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已有不少專著論述<sup>3</sup>，其主要觀點可詳見下文。可惜的是，漢學領域對柯氏關注之研究數量與質量則遠遠落後。

職是，本文主要聚焦於柯氏短篇小說〈三代之愛〉，並以此例說明早期共黨革命一種具備全球化與在地化性質的「戀愛加革命」文學典範，並分析作者如何經由創作意圖、技巧、策略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藝遺產結合其政治理念，向東亞與世界各國傳播她的婦女與性別政策。此篇小說之主要用意，不僅針對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甚至在於提醒俄國十月革命過後專政的無產階級，皆應關注與重視女性議題，萬不可忽視此一性別力量。

如前所述，儘管柯倫泰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世界各國媒體中叱吒風雲，當時可謂家喻戶曉，但經國民黨與共產黨長期威權歷史論述下刻意的打壓與遺忘，當代中文讀者已不熟稔其人其文，故先將其生平簡述如下。柯氏生於俄羅斯聖彼得堡一顯赫的貴族家庭，其父姓氏達蒙多維奇（Домонтович），為土俄戰爭（1877-

<sup>3</sup> 英語研究專書方面，可參閱 Cathy Porter, *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ontypool: Merlin Press, 2013);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日語專書則可參見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東京：新樹社，2001年）。關於柯倫泰的俄語研究專著數量最豐，可參閱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Коллонта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3); Михаил Олесин, *Первая в мир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Л.П. Шумриков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Женщина и политик* (Махачкала: ДГУ, 1992); Г.В. Папакин, *От марта до сентября*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Украины, 1990); З. Шейнио, *Путь к вершине: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А.М. Коллонтай* (М.: Сов. Россия, 1987); Е.И. Бреслав, *А.М. Коллонтай* (М.: Мысль, 1974)。

1878) 中立功之烏克蘭哥薩克將軍，深受沙皇信任而外駐保加利亞。柯氏成長的不同階段分別受俄羅斯民粹主義 (народники) 與無政府主義理想的感召，然而真正投入社會運動則是因九十年代末期在瑞士蘇黎世主攻經濟學時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之後，柯氏又遍遊英、法、德等歐洲各地，認識英國工黨與工潮後，回到俄羅斯時與列寧 (В.И. Ленин, 1870-1924) 結識，並成爲好友。當時她已嫁爲人婦，並從第一任丈夫改姓柯倫泰，亦育有一子。然而，婚後她卻毅然離開優渥環境，「拋夫棄子」，爲開啓其政治生涯而先後加入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柯氏成爲新俄羅斯政權的人民委員會社會福利部部長，在中央委員會中排名第五，權力與聲名更高於當時第八的史達林 (И.В. Сталин, 1878-1953)<sup>4</sup>。兩年後更出任婦女部部長，爲新興政權提供婦女、兒童與兩性政策的施政依據。

一九二二年夏天，列寧因第一次心臟病發而退出政治圈，由當時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史達林召喚在奧德薩 (Одесса) 的柯倫泰回到莫斯科，並委以外交職位。柯氏因不久前與舊情人施烈普尼科夫 (А.Г. Шляпников, 1885-1937) 組織「工人反對派 (Рабочая оппозиция)」，共同反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НЭП)」，而遭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譴責並威脅要將她開除黨籍，政治聲望降至谷底，前途茫茫。加上柯氏與戴本柯 (П.Е. Дыбенко, 1889-1938) 之間「偉大的愛情」已然結束<sup>5</sup>，這段不被看好的婚姻持續不久，她就飽受丈夫陸續不斷的婚外情之苦<sup>6</sup>。在柯氏生涯中這段政治、愛情與婚姻堪稱坎坷的期間裏，史達林的召喚委任，無疑地爲柯氏帶來重返政壇高峰的希望。然而，根據波特 (Cathy Porter) 的分析，史將柯安置於外，除了借重柯氏口若懸河的外語能力與長袖善舞的外交長才，也爲了抵抗日軍日漸侵入西伯利亞的經濟封鎖而推行新的蘇維埃外交政策，更主要的原因則是爲了瓦解「工人反對派」對內部的壓力，將柯氏的政治影響力邊緣化。儘管年逾半百的柯氏此時還信心滿滿，認爲自己終將如旋風般再起，但健康惡化與身心俱疲卻迫使她不得不承認，隨著「工人反對派」的挫敗，自己在俄羅斯的

<sup>4</sup> Leo Trotsky, *Stali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1941), pp. 220-221.

<sup>5</sup> 柯、施與戴三人之間的戀情與關係，可參閱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9期（2011年12月），頁17。

<sup>6</sup> 關於柯與戴之間婚姻衝突的來龍去脈，可參閱 Cathy Porter, *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p. 367-368.

政治事業或許是就此完結了<sup>7</sup>。

正在體認自己的政治事業即將結束之際，柯倫泰似乎回憶起自己年輕時代在成為家庭主婦之餘而未竟的文學夢想——成為一位作家<sup>8</sup>。此時史達林任命柯氏為蘇聯貿易代表團的一員，十月初前往挪威進行商業協商。就在抵達奧斯陸後不久，代表團團長通知柯倫泰克里姆林宮即將對她發布新的任命。在等待下一道命令的三個月內，她住在一家小旅館裏，一頭栽進了寫小說的熱忱中，完成了兩本她最著名的三部曲小說，分別為《工蜂之愛》（*Любовь пчел трудовых*, 1923，下簡稱為《工蜂》）與《轉變中的女人：心理學專題》（*Женица на перелом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1923，下簡稱為《轉變》）。兩本書的形式皆由一篇中篇小說與兩篇短篇小說構成。前者內容包括〈瓦西里莎·馬勒金娜〉（Василиса Малыгина）、〈三代之愛〉（*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與〈姊妹〉（*Сестры*）。誠如羅伯桑（Sheila Rowbotham）所云，在這些愛情小說當中，柯氏持續深入她先前政論性文章〈家庭與共產政府〉（*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918）與小冊子《新道德與勞動階級》（*Новая мораль 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1911）探索的主題：如何將個人生活與政治理念複雜化地連結起來，以及如何使兩性關係從過去女性經濟仰賴男性的桎梏當中解放出來<sup>9</sup>。《轉變》的知名度遠低於《工蜂》，其小說標題則分別為「大愛」（*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隔牆有耳」（*Подслуша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與「三十二頁」（*Тридцать две страницы*）。

不論是英美文藝評論抑或歷史學家盡皆認為，在這六篇小說當中，最為著名也是最具爭議的，當屬短篇小說〈三代之愛〉<sup>10</sup>。這短短十二頁的一篇小說引起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青年之間廣泛討論，且風潮不僅出現在蘇聯、英美或日本的文藝界，亦可在一九二八年大量的柯倫泰小說譯本進入中國後找到相對應的例證，著實耐人尋味。是以本論文將聚焦在《工蜂》的〈三代之愛〉，主要討論這篇小說如何被譯介到日本後轉入中國，又是如何在中、蘇與日本三國的文壇和

<sup>7</sup> Ibid., p. 369.

<sup>8</sup> Ci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in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of Worker Bees*, trans. Cathy Porter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2004), p. 8.

<sup>9</sup> Sheila Rowbotham, "Afterword" in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of Worker Bees*, p. 223.

<sup>10</sup> 參閱 Cathy Porter, *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p. 373-374;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 330;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 230。

政壇引領風騷，捲起爭論，進一步影響了三國知識分子的創作、戀愛觀，及其私人的真實生活。

## 二、問題意識：嫵嫩、愛情與革命

在開展〈三代之愛〉的文本分析之前，值得關注的幾個前提要點如下：首先，做為文學家提出婦女的社會問題的柯倫泰，遠比身為政治家提出性別與家庭政策來得更「驚世駭俗」，且更具「破壞性」（對傳統父權而言），這亦是此文探究的重點之一。其次，筆者業已考證柯倫泰第一本進入中國的作品〈家庭與共產政府〉不僅是她的政治思想精華，更顯現了柯氏演講魅力與宣傳能力<sup>11</sup>。同時，在過往研究中，筆者亦論證了柯倫泰不只為女性的未來宣傳其革命理想，背後仍不乏個人的政治算計與目的。而前述種種條件恰巧與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暗合。於是，當時身為上海國民黨宣傳組組長的共產黨員沈雁冰（茅盾）接下這個任務，成為翻譯柯倫泰第一本書的中國譯者<sup>12</sup>。然而，柯氏此部著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相對地處於「政治宣傳」層面的影響，故而未引起文壇騷動。

一九二七年隨著國共關係破裂，在蘇聯被禁止的柯氏兩本小說卻突然開始大舉東來，而其翻譯在東亞中、日兩國捲起風雲。若循前脈絡與邏輯來看，其背後政治目的自然引人好奇，甚至啓人疑竇。首當其衝者，《新女性》雜誌不僅第一時間翻譯三部曲其一的〈三代之愛〉，並特為此文專開「戀愛與新性道德」論壇。其後短時間內，更有不少中國左翼譯者，如沈端先（夏衍）、汪馥泉、溫生民、周起應（周揚）、楊騷、過立先和李蘭等人，投入柯氏小說與相關議題的政治著作翻譯<sup>13</sup>。一時之間，翻譯戀愛、新性道德與階級，以及相關方面的社會問

<sup>11</sup> 請參考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1-33；Hsiang-Yin Sasha Che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ransmitting and Translating Kollontai in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May Fourth China," in *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Others (1829-2010)*, ed. James St. André, Peng Hsiao-ye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pp. 189-210。

<sup>12</sup> 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

<sup>13</sup> 這些翻譯分別有沈端先、汪馥泉譯：《戀愛與新道德》（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楊騷譯：《赤戀》（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溫生民譯：《赤戀》（上海：啓智書局，1929年）、《戀愛之道》（上海：啓智書局，1929年）；李蘭譯：《偉大的戀愛》

題探討（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文壇的「革命加戀愛」小說主題相互呼應）風起雲湧，不但填補了「清黨」與「分黨」後共黨宣傳青黃不接的問題，亦對中國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的文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即針對此影響、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等層面展開中、日、俄三方的史料考證與問題辯證。

與此同時，身為第一位翻譯柯倫泰的中國譯者茅盾，是最早使用「𦉳」「𦉳」二字，並在個人創作中影射柯倫泰主義傳入中國後引發革命青年男女間普遍的戀愛行為及精神現象。「𦉳」「𦉳」二字，多次出現在《蝕》三部曲的用字遣詞當中，故而引起筆者的注意。本文𦉳𦉳摒除粵語、閩南語或其他地方用語的意義，以康熙字典字義，並符合柯倫泰及茅盾文本脈絡的意義為主要探討依歸。「𦉳」字顧名思義，一女處於兩男中「左」顧「右」盼，在康熙字典中意義為「擾」，今解為「糾纏」。至於一男周旋於兩女之間的「𦉳」，康熙字典中謂之為「嬌𦉳也」，現作「戲弄」解。糾纏與戲弄兩義，頗得柯倫泰在他作所云「戀愛遊戲」(игра любви)之精要。故而可以理解，茅盾運用此二字，不僅可映照出娜拉出走後中國青年男女在社會中所遭遇的性別問題，亦效法柯倫泰假戀愛與性愛問題為名，在政治層面上影射了當時知識青年「左」顧「右」盼，甚至是在新舊徘徊、糾纏和掙扎的多種／重意識形態之爭。

儘管明清通俗小說亦常見𦉳𦉳二字，且多數情節涉及性愛，然而，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間中國的革命加戀愛小說，卻不能單純視為明清通俗或晚清狎邪小說的繼承。當中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兩性之間的糾纏和戲弄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男尊女卑或者主僕之間的權力機制。兩性關係的性愛與戀愛，對魯迅及當時多數的左翼作家而言，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發展的兩個必要條件。誠如這波革命加戀愛浪潮下的中國小說所示，戀愛與性愛既載舟又能覆舟。因為追求個人的自由戀愛，讓激情的青年男女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剷除了舊的婚姻道德，卻來不及建構新的性道德，戀愛乃至於性愛的氾濫無法被虛弱的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的國家機器控制下來，最後不但導致革命失敗，個人又落得一身傷病，賠了夫人又折兵。有趣的是，這種最能激發革命的戀愛與性愛，最終卻成為最必要被穩定下來的因素。這些普遍現象與引發的問題意識 (problematique)，業已在拙作短

---

（上海：現代書局，1930年）；沈茲九、羅瓊合譯：《新婦女論》（北京：三聯書店，1951年）；葉林、段為譯：《工人反對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楊媚月譯：《新婦女論》，（香港：新苗出版社，1994年）；過立先編譯：《赤戀》（上海：開華書局，1934年）。

論中概述<sup>14</sup>。

下文中探討可見，〈三代之愛〉此篇小說雖假借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常見的「三角（兩男一女，抑或兩女一男）戀」題材，但當中所輻射出之問題意識卻遠遠超乎俄羅斯、日本或中國傳統兩性間的性 (sexuality) 或性別 (sex/gender) 之間所顯示的權力結構。綜上所述，本文挪借茅盾吸收柯倫泰而發的文藝創意，將上述種種柯倫泰主義引發革命青年間的多角戀愛、性愛問題與政治意識形態爭鬥等統稱為「嫻嫻」，以對應柯倫泰倡導的愛情「多面性」與「多弦性」，並與英、美、法等國研究在基督教與一夫一妻制度下所指涉之性意識與性別問題做出區別。因此筆者認為，嫻嫻的性意識更具彈性與自由的意義，茅盾在《蝕》三部曲中運用此二字在某一程度上比前述英譯更得柯倫泰精髓。柯氏藉由瑞娘的多角性關係、戀母情結、母系社會與黨國領導崇拜之心理和意識等生活狀態，不僅解構了資本主義與傳統家庭父權，更進一步將其心中理想的女性意識加入新時代、新政權的勞動階級性道德中，意欲建構起如她另一篇小說〈大愛〉所示：一個兩性對等、權力／利共享的勞動王國。以解放女性戀愛與性欲自由來爭取女性權利／力的一種手段，用小說來宣傳和號召全世界青年男女為未來更美好的世界投身革命，以及如何衝撞與衝擊俄羅斯、日本與中國的傳統父權道德，進一步達到柯倫泰與她的追隨者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政治目的。凡此等等問題意識，皆為本文考量焦點。

### 三、〈三代之愛〉在蘇聯

柯倫泰在自己的論文〈新婦女〉的註解中強調，女性創作小說時必須盡可能試著貼近她們的真實生活，「只要被浪漫傳奇化的粗糙寫實越少，越多的當代女性心理學，那些伴隨著她所有的煩惱、情結和熱望，她的內心爭鬥和矛盾，就會越完整和真實地被呈現，對我們將研究的新女性形象素材也益加豐富。」<sup>15</sup> 柯氏慣常撰寫書信與日記<sup>16</sup>，從這些資料中已有研究者指出，「她的寫作缺乏想像力

<sup>14</sup> 關於這一時空下中國革命小說背景的簡論，請參閱拙作：〈嫻嫻、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 (1927-1936)〉，《字花》第 61 期（2016 年 6 月），頁 114-117。

<sup>15</sup> 引自 Cathy Porter, *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 373。本文引文凡翻譯者，除有特別註明者外，皆系筆者所逕譯，不另作說明。

<sup>16</sup> 關於柯倫泰的書信、日記與回憶錄，目前已出版的有下列幾本：*Летопись моей жизни*

與抒情性，傾向於刻畫人物類型 (types) 勝於個性 (individuals)，尤以男性工人、新經濟政策下崛起的男資本案 (Nepmen)，政治活動家與知識分子為最。」<sup>17</sup> 也有不少學者建議，柯倫泰的小說與她自身和周遭婦女的性、愛情與工作等生活方面息息相關，是吾人分析其小說時，不可忽略的<sup>18</sup>。儘管如此，尋找這些小說人物的原型究竟為何人，下文將詳見，讀者和研究者常各執己見，致使柯氏自身對這些議題的意見究竟為何，也常有不同解讀。

但不論究其立場如何引起兩極化的爭議，抑或寫作意圖與要旨如何被模糊化，或者有意無意地誤讀與誤解，在閱讀柯氏小說之前，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她筆下人物絕非純屬虛構。甚至能夠更進一步地說，是來自她生活周遭活生生的例證。柯氏意在呈現一九一七年革命後至一九二三年初之間新俄羅斯社會出現的兩性關係問題，故重點應先擺在「社會問題小說」這一文類的分析，而非全部把它們當成自傳體的「抒情文藝小說」來看待。

### (一) 文本分析與文獻探討

〈三代之愛〉以第一人稱敘述者貫穿全文，然而這個「我」的書寫非關自己的「故事」(рассказ)<sup>19</sup>。小說的前半段是由和第一人稱敘述者同代的女主角奧麗嘉 (Ольга Сергеевна Веселовская) 寫了一封長信給「我」，信中以一種對待「親密同志與黨員」的態度向「我」述說她的母親瑪麗亞 (Мария Степановна Ольшевич) 與她之間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人稱敘述者隨著不同文體——從寫實主義敘述 (realistic narrative)、書信體小說 (epistolary novel) 到對話機制 (dialogism)——的變換而轉變聽者與說者的位置。當文中書信成爲「直接引語 (direct speech)」時，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則頓時變成原先第三人稱的奧麗

---

(M.: Academia, 2004);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1922-1940*, в 2-х томах (M.: Academia, 2001); *Революция-великая мятежница: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1901-1952* (M.: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9); *Из моей жизни и работ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дневники* (M.: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4)。

<sup>17</sup> Cathy Porter, *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 373.

<sup>18</sup> Porter, Farnsworth 與 Clements 皆這一類學者。

<sup>19</sup> 俄文 рассказ 除了指口述、敘述與故事的意義之外，亦可解爲短篇小說。本論文使用的俄文版是依一九二三年第一版的〈三代之愛〉，收入於《工蜂之戀》(M.: Пг., 1923年)，(頁3-51)，之後在二〇〇八年復刻的原文書版本。請參閱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C. 317-351。

嘉，而此時原本的「我」則隱身轉為第二人稱「您」的聽眾，變化另一種對他人告白的方式。

故事後半段則又回到原本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記錄奧麗嘉與她的女兒瑞娘(Женя)<sup>20</sup>先後分別在不同時間來「我」的辦公室，展開兩次一對一(face to face)共三人之間的「聊天對話」(разговоры)。如此一來，小說中主要以三種文體涵蓋了「你」、「我」與「她」三代之間的對話，來做為彼此思想溝通的方式。這是擅於在群眾中演講，長於拉近說者與聽者間彼此距離，使得「你」、「我」和「她」變成「我們」的柯倫泰，不論處在政爭中，抑或做為一個引起社會論爭的「女性作家」最為擅長的一種手段(means)、工具(instrument)，甚至是種魅惑(charm)。對柯倫泰生平與其著作稍有研究的讀者不難發現，一旦她發動政爭或論爭，不管高低(管理階層與勞動階級)、男女或是世代，風潮總是鋪天蓋地而來，而箇中誰也難以倖免或置身事外。

有趣的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書信體式的告白與聊天對話，不論是就當代的，或從過去的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者角度來看，盡皆涉及個人隱私，但在彼時卻是關乎公共領域勞動階級與新道德建立的重要問題。同時，這些告白與對話的作用猶如情節(сюжет)，開展並串連起談話者母女三代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不只牽涉兩代三個女人，更是知識分子之間的告白，以及知識分子與勞動階級之間的「口語對話」，故文中用字遣詞不但十分簡單直白、清楚易懂，也深具生活化的程度和色彩，扼要地勾勒出作者欲表達的文學主題與社會問題意識。這個故事本身的文字風格就如同前述柯倫泰的書信體與日記體，少有浪漫化的想像和抒情，而是被包裝成赤裸且坦誠的「內心話」，以寫實的筆法揭露兩代母女的愛情與性生活，挑戰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封建制度，以及二十世紀初中產階級、資本主義與新政權蘇維埃的道德尺度。

故事一開始交代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任職於某部門(就文中脈絡來看，應是「婦女部(Женотдел)<sup>21</sup>」)，某日早晨接到一封上面寫著「務必親啓」的長

<sup>20</sup> 中國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開始至三〇年代間，出版了大量的柯倫泰小說。然而綜觀這些中文翻譯，可發現其多經由第二手語言(特別以日語為主)再譯成中文。舉此篇小說為例，第一代與第二代女主角翻譯的中文名字與原音差異較小，爭議也較少。但以日文發音而中譯的第三代女主角名字有：蓋尼亞、根尼亞或革利亞等，與原名發音出入甚大，故筆者在此處採俄音直譯。

<sup>21</sup> “Отдел по работе среди женщин”的縮寫，這一部門負責在集體主義的精神下教育婦女、

信，信是由一位任職於國營企業的女性高級幹部奧麗嘉寫給她的。奧麗嘉在她的眼中，是一位專注於工作，精明幹練不下男性，但對「女性問題」並不熱衷且對異性不甚注意的婦女。儘管如此，就「我」所知，奧麗嘉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後，與一位在國家機關內地位遠比她低微、年紀也比她年輕許多的丈夫列亞博科夫(Рябков)結婚，但奧麗嘉的來信說明自己正遭遇極大的困難需要建議與幫助，而引起了「我」（同時也是讀者）的好奇。故事前半段，奧麗嘉在給「我」的書信中，先大篇幅地描繪自己母親瑪麗亞的政治觀點與羅曼史，後詳盡敘述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戀愛史與之相對，勾勒出兩代母女之間的衝突。瑪麗亞是沙俄時代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民粹主義者，相信自由意志與自由戀愛。也因如此，瑪麗亞為愛違背自己雙親，嫁給一位軍官，生了兩個男孩後，又因俄羅斯社會變遷，民智與眼界漸開，精力旺盛的她無法再適應沙俄制度下平庸遲滯的軍官夫人生活，而與另一位契訶夫式的中產階級醫生相戀，離開了軍官，生下奧麗嘉。復以奧麗嘉的父親曾因與沙皇制度牴觸而被流放，回歸家庭後被視為英雄，而與一位放牛少女有了婚外情並離開她的母親，使得奧麗嘉在成長的過程中多為母親照料，未能獲得足夠的父愛。

奧麗嘉因母親的關係，成年後傾向馬克思主義，比她仍舊守著民粹主義的母親更相信除了自由意志與自由戀愛之外，舊俄社會需要徹底改變就必須有集體主義意識和同志之愛。奧麗嘉因從事革命工作，在少女時代就認識比她年長許多的男同志康士坦丁，與他發生婚外情後結婚。後來，又因工作需要而偽裝成家庭教師的身分藏匿在彼得堡一富裕工程師 M 的家中，而與一家之主的 M 雙雙產生「不倫戀」，生下了一個女兒瑞娘。奧麗嘉與瑪麗亞之間除了政治理念不合之外，這兩代母女最大的爭論來自於瑪麗亞認為奧麗嘉應像她從前那樣，在康士坦丁與 M 當中擇一，而非同時愛著兩人，周旋在三角戀（M 的夫人從頭至尾被蒙在鼓裏）中懸而不決。而瑪麗亞因自己的出身階級，更傾向於接近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立場的社會自由主義者 M，這一點亦讓奧麗嘉感到十分惱怒。一九〇五年俄國發生第一次革命之後，奧麗嘉為了政治，選擇和丈夫一起。隨著俄國社會幾次政爭、黨爭和內亂，奧麗嘉和 M 與康士坦丁的政治

---

制訂與宣導婦女政策等事宜，隸屬蘇共中央委員會(ЦК)。一九一九年成立，列寧屬意由法國人艾爾蒙 Inès Armand (1874-1920) 擔任第一位部長，但她卻因肺炎過世。一九二〇年後由柯倫泰接替，故另有說法，認為第一任實質的部長應為柯倫泰。

理念愈顯不合而冷淡疏遠，最後分離。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中年的奧麗嘉又嫁給年輕的無產階級列亞博科夫，和自己的女兒瑞娘住在一起。由此可以想見，瑞娘的成長過程與奧麗嘉相似，並沒有一個象徵「父權道德」的父親成為她生命中的偶像，而多半為外祖母照料的她，因為奧麗嘉長期在外工作，亦缺乏母權教養。

小說的前半段講述了瑪麗亞與奧麗嘉的「戀愛悲劇」（文中奧麗嘉一再使用這個名詞來形容這兩代之愛），這悲劇部分肇因於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俄羅斯動盪的政治與社會狀況，這些時代的因素使得階級、政治、愛情、婚姻與革命的關係糾纏不清、千絲萬縷。讀者可從信中得知瑪麗亞與奧麗嘉兩代故事的來龍去脈。然而信中，作者則賣了個關子：到小說中段讀完此信後，卻仍不能全然得知中年奧麗嘉的苦惱（儘管敏感的讀者已經由敘述中隱隱地感覺不安）。奧麗嘉在信中無法啓齒的，選擇數日後與第一人稱敘述者會面時的對話中揭露：她的女兒瑞娘不僅與好幾位勞動階級的男同志發生性關係，其中也包含自己的繼父，懷孕後卻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加上瑞娘因工作繁忙，沒有時間照顧小孩，因此選擇墮胎。從奧麗嘉與「我」的對話中，這些事件雖使奧麗嘉大受打擊，但讓她更震驚而不解的是，瑞娘並不愛這些男人，她痛心瑞娘對情感、道德與責任感的缺乏。但是據瑞娘自己的說法，她並非出自於肉體欲望和這些男人發生性關係，而是基於某些時刻喜歡某人就與他拉近距離在一起，但不到相愛的程度，自然誰也沒有傷害誰，誰也不需負任何責任，一切就是如此簡單而已。至於瑞娘與繼父之間的關係，她覺得拉近彼此距離原是其母所願，只是她不知道所謂的「親近」界線為何，故不覺得有什麼好隱瞞丟臉的，更不認為自己這麼做會傷害母親。她甚至反駁母親，認為奧麗嘉仍受限於過去「中產階級」的道德觀。在責任上，她工作認真、忠黨愛國，自覺沒有一點對不起他人<sup>22</sup>。

小說最後以瑞娘與第一人稱敘述者會晤的對話終結。在這段對話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扮演著類似心理諮商者的角色，傾聽、回饋並適時地提問，試圖幫助瑞娘釐清和檢視自己的思想，也使讀者理解瑞娘這個時代青年的想法。瑞娘認為，其同輩人因為新俄羅斯的建立，加上多次戰爭與革命後重建需要大量勞力，投注在工作的時間與心力多到根本沒有閒暇去談戀愛。「戀愛」是她母親和外祖母那

<sup>22</sup> 這一段母女之間的爭吵，見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ПБ.: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С. 341-344。

個時代和那個階級下的產物，而自幼瑞娘從她母親身上已經看清，愛情既使戀人痛苦，又讓戀人如敵人般分明。瑞娘與她的繼父年紀相近，按照瑞娘的說法，他們精神與思想上接近，也彼此相互信任，但那並非愛情，只是一時快樂的相互陪伴。而且她認為，她繼父完全屬於她母親的，她一點也不想與繼父在一起，毫無愛情可言，所以也不認為這樣會傷害她母親。在這些對話中，最有趣的是在小說結局處，當「我」質疑瑞娘難道真沒愛過任何人時，瑞娘回答她愛她母親，信仰她母親，而且另有他人：

不單只是母親……還有別人。例如，列寧也是。請您不要微笑，這是非常嚴肅的。我愛他比我一時所喜歡的人當中的任何一個都還要更深……當我得知，我將可以見他且聽他說話，有好幾天我都不是自己了……爲了他，我也可以犧牲生命。<sup>23</sup>

波特的分析指出，一些閱讀柯倫泰的文評家認為柯氏贊同瑞娘對性的態度，甚至如下文將探討的一些中國五四青年作品，像胡也頻的女主角們引用柯倫泰的〈三代之愛〉時，亦以男性角度的觀點認為她鼓吹後人所謂的「性濫交」(casual sex)<sup>24</sup>，「然而在故事中沒有任何意指可以支持這個論點」<sup>25</sup>。波特進一步地反駁這些文評，她認為這篇小說的中心女主角是奧麗嘉，而第一人稱敘述者顯然與她站在一起（關於這一點方斯沃史亦持相同見解）<sup>26</sup>，對於瑞娘的行爲和奧麗嘉這一代曾經奮鬥過的「性解放」毫無相關而感到驚慌失措。柯氏與其說是單純地譴責瑞娘，不如說是試著瞭解新一代「新女性」如何合理化她們的生活，畢竟瑞娘這一代被迫經歷戰爭與革命的混亂，不是全盤放棄性欲，就是抓住機會享

<sup>23</sup> Там же, С. 350.

<sup>24</sup> 克萊門斯在她的研究中提及柯倫泰在二〇年代末的中國廣爲人知，中產階級的中國人引用柯倫泰時，認為柯氏將瑞娘視爲典型(model)，鼓吹性濫交，卻未具體指出是哪一位中國人，只說是她的同事給的資訊。參見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230-231。儘管如此，筆者從二〇年代末期許多中國左翼文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胡也頻在一九二九年創作的〈到莫斯科去〉，當中的女主角夏克英與沈曉芝將柯倫泰的三代戀愛問題解讀爲「性的完全解放」（頁 686），並將之奉爲她們生活中的圭臬，是最爲符合克萊門斯的分析。見胡也頻：〈到莫斯科去〉，《胡也頻選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下冊，頁 685-767。

<sup>25</sup> Cathy Porter, *Aleks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 374.

<sup>26</sup>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 331.

樂<sup>27</sup>。克萊門斯 (Clements) 更具體解釋，這一篇小說必須與柯氏的〈給展翅的愛神一條路吧！——給勞動青年的一封信〉 (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Письмо к трудя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 1923, 下簡稱為〈給勞青的一封信〉)<sup>28</sup> 綜合來看，理解柯倫泰對性的立場並非贊成「雜交」(promiscuity)<sup>29</sup>。

然而，在上述這些以歷史分析為導向的柯倫泰研究，如波特、克萊門斯與方斯沃史慣常將第一人稱敘述者等同於作者，或者是討論小說創作中的哪一個角色更接近作者自身的意見，同時試圖找出小說創作與作者真實生活之間相似處的諸多史料來證實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不同於這些史學家，以精神分析觀點 (psychiatrist's insight) 為主的文學評論家杜依琪 (Helene Deutsch) 則認為，柯倫泰在創作〈三代之愛〉時是不動情感地呈現問題，而且並非意圖要解決這些問題，也非關讚揚或譴責<sup>30</sup>。方斯沃史則辯駁，柯氏絕非扮演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只是忠實地描寫革命時代的性道德而已，相反地，她貼近地將自己置入三代女主角所處的情況中。方斯沃史並引用柯氏的〈新婦女〉 (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 1913)、〈家庭與共產政府〉 (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918)<sup>31</sup> 與〈給勞青的一封信〉，認為這篇小說的主旨符合柯氏最終的理想與最深的寄託——社會主義公社，來駁斥杜依琪在分析上的錯誤，並辯證她認為正確的看法<sup>32</sup>。回到〈給勞青的一封信〉的文本脈絡中，柯氏認為在「公社」的理想內，所有「新人類」的愛情就是同志情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而這種愛情是具有「多面性的」(многогранна) 且「有許多琴弦的」(многострунна)。所以，再也不會有女性覺得孤單，也不會有單人單純因肉體性欲 (無翼愛神) 而結合，而是因為心底的多弦性與靈魂的多面性，來使社會的、勤勞的共同生活更加強化鞏固<sup>33</sup>。除此之外，方斯沃史認為，

<sup>27</sup> Ibid.

<sup>28</sup>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Письмо к трудя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3 (май 1923), С. 111-124. 本文使用二〇〇八年復刻板，收入於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 359-381.

<sup>29</sup>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 230.

<sup>30</sup> Helene Deutsch,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44), vol. I, p. 358.

<sup>31</sup> 關於此文的生成與內容，參見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1-33。

<sup>32</sup>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 333.

<sup>33</sup>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Письмо к трудя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С. 371-374.

當時柯氏正試圖從戴本柯在婚姻中給她帶來的創傷中恢復，所以她以寫小說的方式來驅除自己嫉妒感與性佔有欲的心魔。職是之故，方氏的結論斷定，柯倫泰寫小說是為增強她過去在婦女問題與政策上所做的承諾，找回一個失意政客的昔日光榮，同時也為她失敗的婚姻找合理化的理由，故而作者的涉入甚深，遠非是個冷靜的觀察家<sup>34</sup>。

儘管上述這些以歷史分析取向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學者個個引經據典，言之鑿鑿，她們重視柯倫泰做為一個女人、政治人物與女性主義者的幾個層次，卻忽略分析這篇小說，也是這兩本小說集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柯倫泰如何處理文學作品，以及她身為一個作家該如何自處。她的生平經歷、書信與政論文章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書中究竟哪一主角的立場與她的思想最為接近，但是這些小說主角終究不是柯倫泰。即便是第一人稱敘述者在寫實主義的小說中，亦與作者保持著距離。一位作家就算再如何深入、投入或涉入於創作主角的命運，在寫作的過程中也必定深思熟慮、推敲再三，思考著什麼樣的文字、形式與問題意識可以使這篇小說呈現在自己與世人面前。貴族階層出身的柯倫泰，毫無疑問地自幼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sup>35</sup>，她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瞭若指掌的涵養與程度，將當中許多的文學技巧、主題和結局全數應用在這篇小說中，恐怕超乎以歷史分析為方法論的研究範圍。

## （二）柯倫泰的文藝遺產

首先，〈三代之愛〉使用第一人稱敘述者做為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在這一點上杜依琪的解釋更佳），其用字遣詞與修辭色彩確實中性、不帶情感，更多時候是在同理 (empathize) 奧麗嘉與瑞娘母女，既不表贊同，亦不譴責。在記錄與描寫的過程中，既插入書信，又加入對話，明顯地師承萊蒙托夫 (М.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 的社會與心理小說《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840)<sup>36</sup>。筆者認為，在創作時柯倫泰是有意識地欲把「三代母女」塑造為「三代英雌」，三種典型人物。但鑑於《當代英雄》是一本暗諷舊體制因循不前的小說，柯倫泰創

<sup>34</sup>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 334.

<sup>35</sup> 參見 А.М. Коллонтай, *Из моей жизни и работ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дневники*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4)。

<sup>36</sup> 在俄文原意中，「當代英雄」亦可譯為當代主角或典型。

作的當下，革命不僅已經成功了五年，而她又正因不久前工人反對派而處在政治低潮中，同時黨內政爭山雨欲來，創作名稱取得不妥當，將會引起政敵攻擊，進而影響這篇小說的出版或觀感。

其次，小說的主題聚焦在性、婚姻、愛情與工作，從赫爾岑 (А.И. Герцен, 1812-1870) 的《誰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6)、車爾尼雪夫斯基 (Н.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 的《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1867)、托爾斯泰 (Л.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的《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1878) 到契訶夫 (А.П. Чехов, 1860-1904) 的〈帶小狗的女士〉(*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1899) 等等，一系列關於三角戀或婚外情的社會問題小說，都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在這一主題的文化底蘊，這些作家的創作啟蒙了柯倫泰。在〈三代之愛〉中，契訶夫帶給柯倫泰影響最鮮明的例證，就在小說開放性結局的處理。在呈現愛情與婚外情問題的〈帶小狗的女士〉中，小說結局以拋出問題終結，不提供答案，契訶夫是這樣寫的：

安娜·謝爾蓋耶芙娜與他相愛，猶如十分親近的親人，像是丈夫與妻子，像是溫情脈脈的朋友。他們覺得，兩人爲了對方而存在是命運自身預先的安排，只是不明白，爲什麼他已娶妻，而她也已嫁人；而這正如同一對雌雄候鳥，被捕獲後擺放在不同的籠中生活。他們相互饒恕那讓他們羞愧的過去，原諒當下所有的一切，並覺得如此的愛戀改變了他們兩人。

從前，憂傷之際，他以那些僅能進入他腦中的各種說法來安慰自己，可是現在他不在理喻的狀態。他感覺到深深的同情憐憫，想要變成真誠而溫柔的……

「停停吧，我的可人兒，」他說，「一陣傷心，亦將持續……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有什麼是我們能找到的方式。」

接著他們商量了很久，談論如何使自己擺脫這種必須隱藏、欺騙，且住在不同的城市而長久不能見面的處境。如何從這些難以忍受的枷鎖中獲得自由？

「怎麼辦？怎麼辦？」他抱住自己的頭問：「怎麼辦？」

似乎，再過不久，將會找到解決之道，而屆時，一種嶄新的而美好的生活就要開始。然而，這兩個人心中雪亮：離結束還很遠很遠，而那最複雜與

最困難的，才正要開始。<sup>37</sup>

回到柯倫泰的〈三代之愛〉，契訶夫提出的愛情與婚外情問題困擾著瑪麗亞與奧麗嘉兩代，如前文所示，在柯氏這篇小說中明確地給了一個時間點，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後不久，基本上已經獲得了解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取而代之的社會問題，是以瑞娘為代表的新世代勞動階級崛起，鄙視任何「傳統的」俄國文學與文化底蘊，閱讀的是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未來主義宣言下的產品——「把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等諸如此類者從現代的輪船上丟出去」<sup>38</sup>。在生活中失去對愛情的敏銳度與感受力，只剩下身體——性與工作，以及對黨領導的愛戴與服從，而這正是一直以來身為異議分子的柯倫泰憂心卻不能言明之處。因此，作家讓第一人稱敘述者在聽到瑞娘說「可為列寧犧牲性命在所不惜」此種言語時，做出「微笑」的反應。這樣的「微笑」可以蘊含（或者暗藏）諸多意義，特別是在柯倫泰與史達林當時正因黨內領導權 (hegemony) 與心臟病發的列寧處得不甚愉快的時候，閱讀時不可不有所警覺。

那麼，瑞娘這個「新人類」世代的嫻嫻、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的問題究竟該如何解決？柯倫泰在〈給勞青的一封信〉中，採用了赫爾岑的《誰之罪？》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的思想論述，提出她當時所能想到的解決之道。但是，在〈三代之愛〉小說中，作者卻回到契訶夫式預留空間與時間的開放性結局處理方式：

爲了母親的事情將來還要再來打擾您，請您對我母親說，安德烈完全屬於她的，我已經不要他了。……母親能明白這件事嗎？她今後還依舊愛我嗎？您覺得呢？我是如此地害怕，我不能夠沒有媽媽，沒有她的愛而活著。但又如此令人沮喪，這整件事對她的工作能力產生了影響。不！我才不想像媽媽這樣的愛法……在那種情況下要什麼時候工作啊？

留下這句話，瑞娘走出門外。

但是我站在房間正中央，尋覓著下面問題的答案。哪一方有未來的真理？

<sup>37</sup> А.П. Чехов,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омах* (М.: Наука, 1977), Т. 10, С. 143.

<sup>38</sup> 原文爲「Бросить Пушкин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Толстого и проч. и проч. с пароход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此乃一九一二年十二月 В.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Д.Д. Бурлюк, А.Е. Крученых, В.В. Хлебников 等人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賞社會品味一記耳光」(Пощечи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вкусу)，內文所寫下的一句名言。請參考 В.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 (М.: Гос. изд-во худож. лит., 1955-1961), Т. 13, С. 244。

新階級的真理，帶著新感覺、新理解與新決斷嗎？

而門後傳來瑞娘年輕的笑聲與她精神飽滿的聲音：

「同志，晚上見！請別挽留！……工作很多、很多……。」<sup>39</sup>

〈帶小狗的女士〉與〈三代之愛〉的結局顯示，不同時代與階級處理此主題下諸多問題的態度截然迥異——前者是帝俄制度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惱，另一個則是共產制度下勞動階級的歡暢；前者涕淚縱橫，不知所措；後者則是歡欣鼓舞，樂於工作。然而，這兩篇小說的所有主角（包括〈三代之愛〉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都在尋求一種「嶄新的、美好的」生活願景。他們深信目前遭遇到的問題，都能夠藉由時間來解決。兩位作家選擇開放的結局，將問題呈現在讀者面前，由大眾去思考和尋找解決的方案，這才是做為作家的柯倫泰承繼契訶夫小說主旨，繼續探索由愛情、婚姻到性革命這一連串問題意識的一個寫作目的。

由此可見，柯倫泰在我們面前展現了她性格的多重面貌，她是個女人、母親、演說家、外交家、政治人物、兩性工作者、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繼承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遺產的作家。因此，若不能綜合杜依琪、波特、克萊門斯與方斯沃史的研究來看，無法面面俱到，接近柯倫泰精神的全貌。克萊門斯認為，柯倫泰的小說既無法完整解說她自己所謂的欲望之愛 (erotic love)，又是拙劣的文學作品 (bad literature)，進而暗示柯倫泰作為作家遠不如其他身分傑出<sup>40</sup>。我們閱讀〈帶小狗的女士〉結尾並比對〈三代之愛〉，也很容易發現兩位作家在用字遣詞和營造氣氛上有很大的差異。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柯倫泰的目標讀者群 (target readers) 是把「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等諸如此類者從現代的輪船上丟出去」的勞動「新女性」、「新人類」，以及那些必須進入新時代的過去的兩代貴族、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面對這些勞動青年讀者，柯氏已經無法擺出男性作家如托爾斯泰在創作中那種貴族全知敘述者 (omniscient narrator) 的姿態（不要忘了柯倫泰是貴族出身），更不能是契訶夫作品中流露出來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憐自艾的憂傷 (sentiment)，所以她的用字遣詞必須直接、坦率而赤裸裸，表達問題意識的方式必須平鋪直述而非象徵暗喻，以接近她的目標讀者群。身為作家的柯倫泰也沒忘記自己是個政治人物，難免需

<sup>39</sup>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С. 351.

<sup>40</sup>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 231.

要政治算計，以小說爭取這些勞動青年們的認同與愛戴，〈給勞青的一封信〉的內容才會受矚目，進入「新人類」的耳裏和心裏。

從〈三代之愛〉的故事內容可以想見，這篇小說在當時廣大勞動青年中引起多麼大的騷動和風潮，就連一九二三年已經病入膏肓的列寧也不得不從病床爬起來親上火線，批判瑞娘和她背後的作者柯倫泰這種「一杯水主義」(теория стакана воды) 給時下青年帶來壞影響<sup>41</sup>。給柯氏套上這一個專有名詞，自然是列寧自己的誤解與誤讀，柯倫泰自己及其作品從來沒有出現這一說法。但這一頂帽子自此之後就牢牢地扣在柯氏頭上，成為她的政敵，甚至是後來傳到中國後的國民黨用以對付「柯倫泰主義」，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武器<sup>42</sup>。列寧死後直到一九二八年史達林開始「文化革命」全權在握之前，以「一杯水主義」為精神的小說創作數量達到一個高峰，不少蘇聯男性作家前仆後繼，像是古米列夫斯基(Л.И. Гумилевский, 1890-1976)的《狗胡同》(Собачий переулочек, 1926)<sup>43</sup>與《戀愛遊戲》(Игра в любовь, 1928)、馬拉施金(С.И. Малашкин, 1888-1988)的《右邊的月亮，抑或不尋常的愛情》(Луна с правой стороны или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юбовь, 1926)<sup>44</sup>與阿格涅夫(Н. Огнев, 1888-1938)的《柯斯奇的日記》(Дневник Кости Рябцева, 1927)<sup>45</sup>等等，繼續挖掘十月革命後普遍出現在俄國青年男女之間混亂的「性道德觀」，以及毫無節制、人定勝天的「身體觀」，形成了一種在史達林主義霸權來臨前夕，兩性之間過度精力旺盛的奇特社會現象。有趣的是，上述這些作品被統稱為「蘇聯的性文學」<sup>46</sup>，在一九二七年日本政府與蔣介石分別在日本與中國大規模地屠殺與追捕共產黨員之後，跟隨著柯倫泰所有小說和政論著作的腳步進入日本與中國<sup>47</sup>，在暗處爭取兩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女性，加入共產革命的行列。

<sup>41</sup> 克·蔡特金著，馬清槐譯：《列寧印象記》（北京：三聯書店，1954年），頁69。

<sup>42</sup> 請參閱拙作：〈嫵媚、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I）：一杯水主義的誤解、誤讀與誤用〉，發表於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左翼文學工作坊：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會議論文。

<sup>43</sup> 一九三三年周起應（即周揚）、立波（即周立波）合譯為《大學生私生活》（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

<sup>44</sup> 楊騷在一九三〇年《現代文學》第一卷第三、四與六期譯為《異樣的戀》。

<sup>45</sup> 一九二八年林語堂與張友松合譯為《新俄學生日記》（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後於一九二九年查士驥譯為《蘇俄中學生日記》（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

<sup>46</sup> 李今：《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133。

<sup>47</sup> 中國這一部分的研究可參閱同前註，頁130-134。

然而，不管是列寧或者是國民黨，甚至是後來的文藝評論者，皆無法否認一個事實：柯氏這篇具有「負面」影響的「拙劣作品」，竟能在二〇、三〇年代廣大的群眾中引領風騷，從蘇聯風靡到世界各地，當中也包含日本<sup>48</sup>，甚至傳入當時為其殖民地的臺灣<sup>49</sup>，與中國平行同步，為兩國的共產黨吸收了不少青年男女「獻身」革命<sup>50</sup>。接下來，我將探討關於這篇小說進入日本與中國之後帶給兩國左翼文人在創作與生活上的影響，聚焦在具體的文本〈到莫斯科去〉，更進一步以性別與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辯證，究竟柯倫泰的著作是否真的解放了中日兩國的婦女。抑或這一風潮的結果與柯氏期望適得其反，而先解放了兩國的男性？

#### 四、一文各表：瑞娘主義耶？柯倫泰主義乎？

根據日本學者杉山秀子的研究，日本最初對柯倫泰較為完整的介紹是在一九二四年，由女性作家山川菊榮(1890-1980)在《女性》雜誌十月號發表的文

<sup>48</sup> 關於柯倫泰為何與如何對日本年輕的知識分子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可參閱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47-209。

<sup>49</sup> 一九二〇年代末期之後，柯倫泰其人及其小說主要透過翻譯與跨國傳播而為臺灣共產黨黨員，如謝雪紅、林木順等留蘇分子，以及一般的左傾作家如楊遠所熟知。然而，關於柯倫泰在臺灣的影響論述或研究，主要散見於一些當時人的口述、回憶錄或僅為單篇論文之註腳，目前並未見系統性之研究。不僅如此，在傳播的訊息亦常見以訛傳訛的現象。參見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1997年），頁220。謝所說的「コップ(cup)主義」其實是列寧批判柯倫泰而給後者扣上一頂帽子而成的專有名詞，而楊在書中注釋並未指明出處，但其認知與本文考證的柯倫泰思想有所出入。林瓊華則在其論文〈從遺忘到再現：謝雪紅的歷史在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台灣史學雜誌》第15期〔2013年12月〕，頁31。）中卻以為，謝引用了柯倫泰「一杯水主義」的說法，實為常見之誤傳。楊遠與葉陶在二〇年代末期未婚同居，因「戀愛墮落」的罪名被逐出左傾的農組，其背景自然有謝雪紅所指的「コップ主義」影子。此段歷史，可詳見楊翠：《永不放棄：楊遠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臺北：蔚藍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85。施淑老師亦曾當面向筆者強調，楊遠夫婦當年確受柯倫泰作品影響而未婚同居，可惜筆者目前仍未找到白紙黑字的直接證據，僅有不少間接線索支持此論。例如，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臺、日與中國共產黨黨員之間相當緊密的聯繫與關係暗示，這段期間在蘇聯、日本與中國流行的左翼政治和文藝思潮，臺灣夾在當中從未曾缺席。見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研究所，2010年），頁38-100。

<sup>50</sup> 關於蘇聯的政治宣傳與文藝作品傳輸至日本、中國與東亞其他各國的機制，以及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可參閱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1-33。

章〈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女士〉（アレクサンドラ・コロンタイ女史）中，對柯氏爲人有相當善意的介紹<sup>51</sup>。儘管這篇論文並未直接觸及柯倫泰的著作，三年後柯倫泰的小說則陸續進入日本文壇，前後分別爲松尾四郎與林房雄翻譯的《赤戀》（赤い戀）<sup>52</sup>與《戀愛之道》（戀愛の道）<sup>53</sup>，這兩本小說集加總起來正是前述在蘇聯發行的《工蜂》一書，只是透過翻譯者之手改變了小說集的名稱<sup>54</sup>。由改譯的書名可見，「戀愛」加上「赤色」所暗示的「革命」，比起「工蜂」一詞背後象徵的「集體意識」應來得更吸引日本的讀者，提高購買意願。

杉山對於日本接受／排拒柯倫泰的背景，以及她如何引起男性與女性（通常是當時的日本女性主義者），女人與女人，翻譯者與讀者，年輕人和長者，甚至是市民、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論者之間的論爭，有相當詳盡的敘述<sup>55</sup>。此處，我援引她的研究中關於〈三代之愛〉在日本所引起之論戰、論據，及其結果和後續引發社會之影響，綜合簡述如下。杉山指出，柯倫泰之所以引發上述日本等不同階層間的激烈爭執之處，在於她的生平事蹟與著作的戀愛觀相互對照後，顯得十分曖昧不明。當中，尤以瑞娘的生活方式與性道德觀（已被當時年輕人奉爲「瑞娘主義」<sup>56</sup>）是否屬於柯倫泰主義下「戀愛觀」的主要思想，在論爭中形成了「一文各表」——一個文本，各自迥異的解讀與表述的奇特現象。

### （一）一文各表的跨文化結果

《柯倫泰與日本》一書更進一步歸納分析，從日本讀者對〈三代之愛〉的評

<sup>51</sup> 山川菊榮：〈アレクサンドラ・コロンタイ女史〉，《女性》1924年10月號，頁290-291。引自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47。據臺灣學者吳佩珍的考證，日本首位翻譯柯倫泰的思想者則是尾瀨敬止，引自吳佩珍：〈女性解放與戀愛至上主義之間：柯倫泰的接受與日本大正、昭和期思潮變遷〉，發表於一〇三年六月五—六日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赤』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二十世紀蘇聯與東亞的左翼文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

<sup>52</sup> コロンタイ女史著，松尾四郎譯：《赤い戀》（東京：世界社，1927年）。

<sup>53</sup> アレクサンドラ・コロンタイ著，林房雄譯：《戀愛の道》（東京：世界社，1928年）。

<sup>54</sup> 關於此點，事實與杉山秀子的研究稍有出入。據我查證，《赤い戀》即中篇小說〈瓦西里莎·馬勒金娜〉，而《戀愛の道》則收錄〈三代之愛〉與〈姊妹〉兩篇。並非如杉山所指《戀愛の道》還含括〈瓦西里莎·馬勒金娜〉。這一點必須注意，才能明白爲何之後主要由林房雄發動與高群逸枝之間關於柯倫泰的論爭，而非松尾四郎。關於這一論爭的始末和其後傳入中國引起的軒然大波，下文將有詳述。

<sup>55</sup> 請參閱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47-211。

<sup>56</sup> 同前註，頁148。

論中可以整理成下列幾種關於瑞娘主義的性哲學所保持的態度類型。第一，全盤肯定與接受論者。第二，部分肯定與部分否定。第三，幾乎是否定但有某些部分肯定。第四，全面否定論者。最後，間接受到影響者。在這五種類型中，第二到第四屬於壓倒性的多數<sup>57</sup>。屬於第一類型的今野賢三(1893-1969)、秋田雨雀<sup>58</sup>(1883-1962)和林房雄(1903-1975)主要強調，柯倫泰自己也並非完全認同瑞娘，故瑞娘主義並不同柯倫泰主義。至於柯氏下筆描寫瑞娘，其主要意圖是把女性從過去父權、皇權與資本主義掛帥的性壓抑中解放出來，反對中產階級性道德的神聖化，認為人的本能應該被正視和滿足。〈三代之愛〉意在呈現由過去時代轉型至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是對讀者呈現並讓讀者思考問題，作者並非是在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sup>59</sup>。

從第二到第四類型否定瑞娘主義的光譜中，屬於第二類型，對柯倫泰小說有褒有貶的平林泰子(平林たい子，1905-1972)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日本女性主義作家。她不但閱讀吸收柯倫泰，並在消化柯倫泰的過程中將柯倫泰主義日本化、在地化，融入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創作行動。在杉山的敘述中，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平林讚賞《赤戀》的瓦西里莎，卻批判〈三代之愛〉的瑞娘。以創作為業的平林原先認為，當時以政治家為專業的柯倫泰不過是業餘作家，讀了《赤戀》後自己深感慚愧，並認為「這本小說比起日本小說的最高標準還要更加進步」<sup>60</sup>。杉山節錄了平林的回憶錄《沙漠之花》(砂漠の花)，說明平林之所以認同瓦西里莎，主要的原因在於柯倫泰筆下的女主角與平林自己在現實中有相類似的生活經驗，故易將自己投射到角色身上。一九二七年平林泰子與勞工出身且是《文藝戰線》同好的小堀甚二結婚，方驚覺許多自稱為革新派的男性在面對女性時，事實上仍是非常守舊且殘暴的，這令她感到無比氣憤。在她與男性的婚姻生活內，生活費經常是由她來全面維持，而她的男性伴侶則好逸惡勞，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因此夫妻之間常有口角。但隨著平林漸漸被日本文壇認可，她也改變了想

<sup>57</sup> 同前註，頁 152。

<sup>58</sup> 請參閱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 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 16-17。註四十五亦曾說明，秋田雨雀幾乎把柯倫泰視為偶像，在此全盤肯定並非意外

<sup>59</sup> 請參閱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 151-156。

<sup>60</sup> 平林たい子：〈コロンタイ女史の「赤い戀」について〉，收入《平林たい子全集》第十卷(東京：潮出版社，1976-1979 年)，頁 292。引自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 157。

法，認為隨著自己經濟能力的增加，「已經不想嫁人了。她的生活目標轉變成要用自己的力量，有很多個丈夫」<sup>61</sup>。然而事與願違，平林終究被有婚外情和私生子的丈夫狠狠背叛，境遇猶如瓦西里莎。這些生活經驗與問題都濃縮在她的《女人問題》（女の問題）、《光亮的黃金地》（エルドラド明るし）、《無產階級之星》（プロレタリアの星）與《無產階級的女人》（プロレタリアの女）等小說內<sup>62</sup>。

可以理解的是，平林就在為衝刺事業，忙不完的家事和擺不平的丈夫婚外情等多頭同燒的男女不平等關係中，諷刺並批判了柯倫泰的瑞娘，並對瑞娘主義在日本年輕人當中引起戀愛摸索者的風潮，平林提出非常嚴肅的勸告：

我反對打算就將柯倫泰的戀愛觀移植進入日本的一群理所當然主義者。將此硬套在階段尚有顯著差異的當今日本的話，並沒有無產階級鬥爭的部分改良過程中，男女關係猶如水中幻影。不論這些男女多有耐性地等待，通過「肉體結合」，其特徵就只是不想從事「階級鬥爭」上的進展，卻把「肉體結合」當成了革命行動本身一樣。<sup>63</sup>

從這些敘述中可以看出，平林把瑞娘視為柯倫泰主義中戀愛觀的一部分，而與其說她反對蘇聯〈三代之愛〉的瑞娘，不如說她無法贊同的是日本無條件將瑞娘的複雜肉體關係奉為無產階級革命與階級鬥爭圭臬的跟從者，將性交當成革命行動的主要部分，而忘記了革命的宗旨之一是為性解放與兩性平等。

另一位在否定論中引人注意的代表，是僅肯定小部分而否定大部分的高群逸枝。對杉山而言，高群與林房雄的全然對立中牽涉的論述層面比其他日本評論者來得更為廣泛且專業化，除了論爭男女視角的不同與文化差異之外，亦在資本主義官僚式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戀愛觀等層面上交鋒。有趣的是，身為女性的高群主要引用代表蘇聯官方正統的男性權威，包括列寧的「一杯水主義」與史維爾德洛夫共產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Я.М. Свердлова, 1918-1937）<sup>64</sup> 查爾金（А.Б. Залкинд, 1888-1936）教授提倡的「革命無產階級者的

<sup>61</sup> 平林たい子，《砂漠の花》，收入《平林たい子全集》第七卷，頁291。引自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65。

<sup>62</sup> 請參閱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60-167。

<sup>63</sup> 平林たい子，〈婦人と戀愛〉，收入《平林たい子全集》第十一卷，頁35-36。引自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66。

<sup>64</sup> 史維爾德洛夫共產大學是由布爾什維克黨與全蘇聯中央委員會成立的高等大學，用以培訓與教育共產黨黨員與蘇維埃行政階層。

十二條性戒律」(Двенадцать половых заповеде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來反駁身為男性的林房雄所主張的馬克思女性主義者指標——柯倫泰<sup>65</sup>。

如此一來，無疑使「女性問題」在跨文化實踐中更加複雜化，究竟「女人問題」應由純粹的日本女性做為發言代表，抑或從男性關心女性問題的立場出發，亦可當成一種準則被接受？最弔詭的是，高群反對柯倫泰主義，除了因為她將柯倫泰的戀愛觀過於簡單地導向瑞娘的性哲學之外，也對道聽塗說而繪聲繪影的柯倫泰生平事蹟具有反感情緒，所以批評的話語既主觀又像挾帶個人私怨一般，毫無根據可言。例如，她認為「柯倫泰不描述理想的男性，是因為對那樣的人感受不到愛意，而她所喜歡的是愚笨，像流氓一般被玩弄的男性」<sup>66</sup>。依據杉山邏輯，我們不禁反過來問，如平林與高群所描繪的，一些在私生活中常擁三妻抱四妾卻在公領域裏全然支持柯倫泰的「瑞娘主義」的日本男性左翼文人，或者如林房雄在其文開端就介紹柯氏乃是一位「據說換了三十幾個丈夫的美婦」<sup>67</sup>，這些男性在關心所謂「女性問題」的同時，難道不正也暗藏著男性窺淫狂與私欲？

## (二) 「新婦女」與父權道德的衝突

職是，從上述這些理想、理論和實踐的矛盾不難看出，柯倫泰的小說在前進日本的道路上，在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父權道德檢視之下備受爭議的「隱私」始終如影隨形，加之她的「新婦女」理想與理論在列寧的「一杯水主義」批評干預下就像蒙上一層陰影，一再地被黯淡化與模糊化。身為世界上第一位同時具有作家、革命家與外交家身分的女性共產黨黨員，在民族與帝國主義抬頭而壓制共產主義的日本，終也躲不過被醜化和污名化的命運。毫無疑問，柯氏早已預見這些排「國」跨海，接踵而來的批評聲浪，卻仍憑藉自身過人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發表這些問題小說。這正是為什麼她在一九二七年《赤戀》成書出版時，序中一開始就直陳這本小說非關「道德律」：

小說中提及的許多問題並非絕對都是蘇俄特有之問題。這些問題不管是在哪一國皆可見到，是世界現象。……我們能將人類在戀愛關係時的行為當成基礎，而由此判斷他做為一個人的價值嗎？不能！我是這麼想的。一般

<sup>65</sup> 請參閱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75-178。

<sup>66</sup> 高群逸枝：〈排官僚的戀愛觀〉，《中央公論》1928年8月號，頁63。

<sup>67</sup> 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新女性》第3卷第9號（1928年），頁1033。

而言，只要他為超越比較融通自在的一定範圍的話，所謂的性生活就應屬於他自己的「私事」。因此，一個人的真正價值不應該是由其所在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來決定，而應該由他的工作、才能、意志，以及他在國家社會中的有用性來決定。<sup>68</sup>

柯氏更在序中激昂陳述，現今婦女做為一個社會人應有的能力被認為是比她在家庭道德上「善良」來得更重要的事。即便如此，這樣的婦女仍未受到社會真正的肯定與國家的尊敬。如果真能從知識分子共有的性道德來看，就算一個並非「乾淨之身」的婦女，但在政治、藝術、科學上擁有一技之長，就不致招人閒言閒語。因此，她將這本書公諸於世，是衷心希望能有助於社會人們和舊式知識分子在道德判斷上的偽善鬥爭。最後，她再次強調人必須要對婦女的「善良道德」，也要對自己的階級、國家，以及全體人類完成各項義務，在性生活這一事上展現真摯的一面<sup>69</sup>。

如上所述，在日本不論肯定或否定柯倫泰者，或多或少將柯倫泰主義與瑞娘主義劃上等號、母子集合，或者是從屬關係，致使〈三代之愛〉內許多嚴肅的問題意識被扭曲為窺探祖孫三代性生活的小說創作，而柯氏卻變成共產黨內鼓吹集體性濫交的鼻祖。然而，不論對這篇小說持佳評抑或具惡諷，杉山的總結論顯示，即使否定柯倫泰者佔了多數，但無可否認的是，柯倫泰對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日本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創作風潮的推動，絕對功不可沒<sup>70</sup>。例如，在第五類型間接被影響者當中，杉山就列舉了當時幾位知名的女性作家或者是男性針對女性議題而創作的作品，像野上彌生子(1885-1985)的小說《真知子》(1928-1930)、片岡鐵平(1894-1944)的《愛情問題》(愛情の問題，1931)、江馬修(1889-1975)的《清子的經驗》(清子の經驗，1931)，以及德永直(1899-1958)的《在《赤戀》之上》(赤い戀以上，1931)等等，論證了柯氏在日本女性文學中的廣大影響<sup>71</sup>。

值得一提的是，高群逸枝和林房雄之所以為中國文壇特別是左翼文人與女性作家熟知，乃因他們二人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到八月號《中央公論》為柯倫泰主義與〈三代之愛〉打上擂臺，其內容隨即於同年被翻譯並刊登在中國《新女

<sup>68</sup> コロンタイ女史著，松尾四郎譯：〈序〉，《赤い戀》，頁1。

<sup>69</sup> 同前註，頁2-4。

<sup>70</sup> 請參閱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94-209。

<sup>71</sup> 同前註，頁147-209。

性》<sup>72</sup>，使得論爭星火得以跨海延燒並在中國燎原，吹皺了青年與男女的一池春水。在翻譯了〈三代之愛〉，以及高群與林的論戰後，中國《新女性》分別又在同年的第三卷第十一期與第十二期另闢「非戀愛與非非戀愛」與「新戀愛問題」的戰場，使得開始全球化的柯倫泰主義與瑞娘主義，從日本在地化的論爭更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在地化的迴響、討論和創作風潮。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即係直接受到柯倫泰思想的衝擊和影響而產生的中國作品。該作除了因應這股全球化的柯倫泰主義，更是回應這股透過蘇聯化並再藉日本化後才進入中國的瑞娘主義浪潮。經歷上述幾股力量的撞擊與雜揉，〈三代之愛〉如何中國在地化，如何開花結果，則是本文接下來的探討重點。

## 五、〈到莫斯科去〉：〈三代之愛〉的中國化與在地化

中國知識分子熟知柯倫泰的時間並不晚於日本，如我先前研究所提，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一九年初間，李大釗就已在《新青年》第五與六號撰文介紹「郭冷苔」女士，而瞿秋白第一次赴俄時亦曾簡單記述柯氏的共產主義家庭政策<sup>73</sup>。因此毫無疑義，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中國正如上述日本一樣，對柯氏個人生平與其著作倍感興趣。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不注意，兩國在接受柯倫泰時所處的背景與透過的管道有所不同，影響層面、範圍與其普遍性也就呈現顯著差異。

### （一）跨文化實踐的中、日政治與文化差異

首先，當時的中國皇權早已崩落，處於軍閥割據且政權四分五裂的狀態。孫中山雖僅是共產國際資助的對象之一<sup>74</sup>，但打著「以俄為師」與「國共合作」的旗號做為政治號召，又有蘇聯紅軍顧問主辦的黃埔軍校引為支撐，聲勢浩大，大有中國的「列寧」之姿，而當時的國民黨更有「列寧式政黨」之稱。故在

<sup>72</sup> 請參閱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與高群逸枝著，芳子譯：〈排官僚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9號，頁1033-1058。

<sup>73</sup> 請參閱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24。

<sup>74</sup> 馮玉祥亦曾為共產國際資助的對象之一。參見馮玉祥：《我的生活》（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頁410-446。

一九二七年「清黨」與「分黨」以前，國共兩黨無論是中央或底層，左右兩派抑或男女老少，不管下野或在朝，都難免迎合「到莫斯科去」的政治熱潮。如先前研究業已指出，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極度機密地派遣了以蔣中正為首的代表團赴蘇聯，加速了國民黨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面實際合作的腳步<sup>75</sup>。蔣的訪蘇與聯俄，使得日後蔣經國決定前往莫斯科學習時並未受阻撓，同時也讓共產國際確立了短期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仍必須依附在國民黨之下革命的方向<sup>76</sup>。再如一九二五年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弑之後，嫌疑最大的右派領袖胡漢民在被軟禁三天後，也不得不以駐蘇聯大使的身分避走莫斯科<sup>77</sup>。或如一九二六年汪精衛因中山艦事件下臺後出走法國，次年回程時也到莫斯科去見了史達林。又如一九二七年，原先在英美媒體上有「赤色將軍」(Red General) 稱號的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引起孫文的未亡人宋慶齡撻伐，宋旋即接受共產國際資助前往莫斯科<sup>78</sup>。根據研究顯示，上述這些政治風雲人物前往莫斯科的動機與原因多源於政治考量與情勢，莫斯科一時之間成為國民黨左右派與共產黨要員往來的革命聖地，亦有些人將之視為避難之所，抑或應許之地<sup>79</sup>。諸多例子信手拈來，政治表象顯示國共兩黨中央高層穿梭於中蘇之間，故可想見，「到莫斯科去」的嚮往與口號在一般青年男女間會是如何蔚為風潮。

反觀日本，日本共產黨成立的背景是在「明治維新」過後，天皇制度重新確立，軍政權力統一並邁向帝國主義的局面。若公開反對天皇制者即為大逆，難逃死刑。誠如美國學者所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共產黨的發展及其運動主要把持在一小群人手中，且這些人所倡之極端運動並未或是極少與當時日本主流

<sup>75</sup> 請參閱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11。

<sup>76</sup> 自國民黨代表團團長蔣中正密訪莫斯科後，國共合作益趨緊密。關於此點，美、俄學術界看法幾為一致。蘇聯解體後，俄國方面更釋出過去簽署之秘密文件，公諸於世，此一因果殆無疑義。可參閱 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15-135;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1920-1925*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и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минар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1994), С. 243-488。

<sup>77</sup> 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p. 184.

<sup>78</sup> 關於宋接受共產國際資助這一事件的一些研究，可參閱拙作：〈「自我」的符碼與戲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中國文哲所研究集刊》第44期（2014年3月），頁107。

<sup>79</sup> 詳見註69至73等所有研究。

知識分子——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改革者——結合一起<sup>80</sup>。二戰前的共產革命戰略不但反其道而行，第三國際還更下達指令，意欲在日本發起廢止天皇制的風潮，可以想見這使日本共產黨在最初成黨時種下了多少內部矛盾<sup>81</sup>。更重要的是，不同於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日共從建黨一開始就被嚴密監控，不僅內部組織結構鬆散，資訊錯誤百出，情報系統粗糙，成員稀少又年輕稚嫩，還經常被政府間諜、特務警察和檢調系統滲透而在活動中被一網打盡<sup>82</sup>。加之孤「黨」難鳴，日共隨時可能在日本政壇中消失的狀態下顛簸發展<sup>83</sup>，這與上述中國國共兩黨攜手壯大「到莫斯科去」的歷史背景十分不同。因此不難理解，一些學者為何將柯倫泰小說東傳後，柯倫泰主義在日本能成功傳播並被廣泛接受主要歸因於大正、昭和時期的女性解放運動思潮<sup>84</sup>，而非僅依靠共產黨員、知識分子或者左翼文人（包含同路人）的翻譯與宣傳。

柯倫泰熱潮在中國傳播與接受之迅速與廣泛，和上述在日本的情形並無二致。然而，中、日兩國之間還有另一值得注意的迥異之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不少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的兩黨青年與一些「高幹子弟」，不但感染了當時蘇聯兩性關係中受到柯倫泰小說鼓舞後而流行的「戀愛加革命」氣息，甚至在黨員間早已公開支持並力行「一杯水主義」。舉例而言，陳獨秀的次子陳喬年在蘇聯學習時，某次旅莫支部全體執行委員連同青年團的幾位團員聚會討論「革命家的戀愛觀問題」，便即公開發言：

革命家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只有性交，因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動性的，因而不能結婚；同時革命家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那種小布爾喬亞戀愛的玩意，所以沒有戀愛。走到哪裏，工作在哪裏，有性的需要時，就在哪裏解決，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支香煙一樣。<sup>85</sup>

<sup>80</sup> Robert A. Scalapino,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5.

<sup>81</sup> 立花隆：《日本共產黨の研究（一）》（東京：講談社，1983年），頁66-67。

<sup>82</sup> 同前註，頁49-118。

<sup>83</sup> 同前註。

<sup>84</sup> 例如，上述杉山秀子的研究與臺灣的學者吳佩珍皆持此見。詳見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頁136-146；吳佩珍：〈女性解放與戀愛至上主義之間：柯倫泰的接受與日本大正、昭和期思潮變遷〉，頁1-14。

<sup>85</sup> 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年），頁161。作者在此書中另註，認為陳喬年的「一杯水主義」應是受到柯倫泰的〈三代之愛〉影響。此處必須注意的是，陳碧蘭的記憶很可能出現些訛誤。例如，陳指出她回中國

如此論調，如若同二〇至三〇年代中國知識青年一般熟知〈三代之愛〉者，自然可從其中清楚辨析，若干字句源自也全然符合瑞娘的口吻。故待柯倫泰小說來到中國，一些原在莫斯科就支持此一論調的國共兩黨留蘇青年遂也成此熱潮的一個媒介，推波助瀾。

此外，柯倫泰本人也與一些到莫斯科去的國民黨要人和中共作家私交甚篤，使得柯倫泰對二〇與三〇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不僅只是在公領域中遙不可及的蘇聯革命家、知名作家或兩性關係專家，更為貼近甚至是影響個人私生活的一位國際友人。例如，與柯氏背景相仿的宋慶齡赴蘇後在俄生活將近九個月，被安排與柯氏同住了一個屋簷下，據說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sup>86</sup>。同時，柯氏亦擔任了負責照料宋氏在蘇生活的招待組組長<sup>87</sup>。與宋氏同行的陳友仁一家，在蘇生活期間亦受柯氏不少幫助<sup>88</sup>。此外，詩人蕭三與他的第三任德國妻子葉華能夠終成眷屬，柯倫泰居中調節頗有功勞。蕭與葉相戀過程中，拜蘇聯正興「自由戀愛」之風與坊間訛傳之「一杯水主義」所賜，如葉華所云：「結婚被認作是資產階級的一種俗套。於是誰跟誰都可以同居，也可以隨便分手。同時人工流產也合法化了。」<sup>89</sup>蕭三與他的第二任俄國太太瓦莎，以及瓦莎的新生活伴侶，俄裔猶太人漢學家留賓，加上葉華四人同居一屋，故蕭的兒子阿郎在那段時間內同時有兩個父親和兩個母親，充分在一個家庭中體現了左翼國際主義的複雜關係<sup>90</sup>。

先前研究業已指出，柯倫泰在二〇與三〇年代的中國快速被傳播與廣泛地接受，有一部分原因來自人為的操作：柯氏承繼了晚清民初中國小說對俄國虛無黨人與東歐女豪傑的旖旎想像，而中國譯、讀者（包含國、共兩黨黨員）也試圖將柯倫泰的蘇聯建國功業與《孽海花》的夏雅麗形象，以及《東歐女豪傑》的蘇菲

---

後，在一九三〇年左右讀了〈三代之愛〉，當中女主角提出兩性關係猶如口渴了喝一杯水一樣的說法。但是筆者考察了二〇到三〇年代的現有俄文原本和中譯版本，內容並未出現這樣的語句。

<sup>86</sup> 請參閱 Israel Epstein, *Woman in World History: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5), p. 202；劉家泉：《宋慶齡流亡海外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3。

<sup>87</sup> 參見劉家泉：《宋慶齡流亡海外歲月》，頁3。

<sup>88</sup> 請參閱陳友仁的女兒 Si-lan Chen Leyda, *Footnote to History* (New York: Dance Horizons, 1984), pp. 119-120。

<sup>89</sup> 耶娃·蕭（葉華）著：《世紀之戀——我與蕭三》（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頁13。

<sup>90</sup> 同前註，頁16-23。

亞神話相互連結，形成一顯見的文藝的與政治的遺產繼承<sup>91</sup>。同時，柯倫泰的出現提供一條女性追求現代性與現代化的道路，適時地「拯救」了那些因晚清民初的個人主義崛起出走而感到虛無失落的娜拉們，在二〇年代末到三〇年代中期的關鍵時刻讓她們走向了集體主義<sup>92</sup>。如同一九二三年初日本首位翻譯柯倫泰的尾瀨敬止，選擇了她的「家庭解放論」做為柯氏進入日本社會的第一槍響聲，沈雁冰（茅盾）於同年底亦將〈家庭與共產政府〉視為柯氏進入中國之首選<sup>93</sup>。而在中、日、蘇三國解放了傳統家庭與婚姻，緊接而來的個人戀愛問題，也就是柯氏小說關注而欲揭露之社會問題，在文本的跨文化旅行中能得到日本與中國知識分子熱烈迴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不得不歸功於女性解放思潮與運動的全球化。

## （二）跨文化的「互文性」與文本分析

一九二九年五月，胡也頻的小說〈到莫斯科去〉就在上述種種歷史原因與大環境的背景下誕生<sup>94</sup>。在此前後不久，胡在自己的私生活中也深陷與丁玲和馮雪峰三角戀愛的苦惱中<sup>95</sup>。不難想見，當一九二八年林房雄的日譯本〈三代之愛〉經由同年中國的雜誌《新女性》第三卷第九期號翻譯進入中國<sup>96</sup>，如何讓胡也頻讀後醍醐灌頂，既為自己的私人苦惱找到一條解放之路，又因而受到衝擊而選擇了與柯倫泰一樣的中篇小說形式，創作了〈到莫斯科去〉。小說從一開始就刻劃幾位青年男女在一生日聚會上大談柯倫泰夫人的三代戀愛問題的景象，試圖讓女主角夏克英、素裳、蔡吟冰和沈曉芝等人針對這一文本各自表述。夏逼素裳表態，是否全然贊同柯倫泰的三代戀愛，而素裳在不表意見之下反笑夏克英：

你還問做什麼呢？你自己不是早就在實行了麼？也許你已經做過第四

<sup>91</sup> 參閱拙作：〈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頁25。

<sup>92</sup> 同前註。

<sup>93</sup> 關於此文本之生成、翻譯與傳播等背景，參見同前註。

<sup>94</sup> 此篇小說在國民黨內清黨與分黨之後出版，故初以〈到M城去〉為題躲避審查，小說中第一至第三部分刊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的《紅黑》月刊第七期。一九三〇年六月則由光華書局出版單行本。見施建偉編：《胡也頻代表作》（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29。

<sup>95</sup> 李輝：《沈從文與丁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1-30。

<sup>96</sup> 關於柯倫泰的小說如何先後進入日本和中國的起源、衝擊與論爭這些過程，已有日本學者秋山洋子研究。參閱秋山洋子：〈コロンタイの戀愛論の中國への紹介をめぐる〉，《駿河台大學論叢》第40號（2010年7月），頁71-90。

代——所以柯倫泰的三代戀愛在你是不成問題了。<sup>97</sup>

有趣的是，夏克英並不反駁素裳的嘲笑，而「做了個怪臉，把眼睛半閃了一下。」<sup>98</sup> 儘管如此話語帶有玩笑的成分，夏之反應亦映照了生活某些真實的情形。這些女主角們最終關於三代戀愛的對話，止於大家都同意了素裳的結論：「誰願意怎樣就怎樣。在戀愛和性交的觀念上，就是一個人，也常常有變更的：最好是自己覺得是對的便做去好了。」<sup>99</sup> 此敘述表面似乎顯得左右逢源、態度曖昧，但事實上卻是支持〈三代之愛〉中瑞娘的論調：只要有時間相互接近且並不討厭對方，能對自己的性行為負責，就不需感到愧疚。

〈到莫斯科去〉一開始就以互文的方式讓讀者明白，閱讀〈三代之愛〉這篇小說對這些中國女主角如何自覺及其未來命運的重要性。胡也頻將小說的時間和空間設定在自己所處的中國二〇年代末，以增加其中人物的真實感，讓讀者產生故事並非純屬虛構，多少帶著自我投射並刻劃周遭他人的可能性。其中情節發展、結構，及其用字遣詞皆十分簡化，可知作家所設定的目標讀者群亦為一般大眾，特別以女性青年為首。然而，胡卻全然不似柯倫泰具有欲承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遺產的寫作動機和野心。相反地，初出文壇的胡是五四運動過後的左翼青年作家，不但對中國文藝傳統不屑一顧，更遑論能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遺產有多麼深刻的認識，故使他在自己小說中對社會問題的瞭解、鋪陳與解決，思考實在過度簡化和兩極化。

處在前述歷史條件下的〈到莫斯科去〉，故事線索始於幾位女性角色對〈三代之愛〉的讀後感開始發展。胡也頻使用男性作家慣用的全知敘述者為手法，透過各角色的立場表態，逐漸讓讀者瞭解女主角素裳，在於她有一位身為國民黨高幹的丈夫徐大齊。而在此文開場的友人聚會中，她又透過一位熟人葉平認識了共產黨員洵白，使得原先一方因為男人給她的刺激太薄弱而對性索然無味，而一方因工作忙碌對愛情毫不關心的兩個人墜入了愛河，雙雙無法自拔。這一段婚外情兼三角戀又因國民黨的清共和分黨後，而使得徐大齊有機會名正言順對洵白展開政治迫害。洵白死後，素裳鼓起勇氣一改過去國共與左右不分的曖昧態度，不僅在婚姻與愛情中做了抉擇，也在政治立場上選擇了共產黨，決定獻身革命而往

<sup>97</sup> 胡也頻：〈到莫斯科去〉，頁 687。

<sup>98</sup> 同前註。

<sup>99</sup> 同前註。

莫斯科去。情節與結局如此安排，不僅呼應此篇小說主旨，亦表達作者之政治立場。

由此可見，胡也頻的小說與其說是開展〈三代之愛〉進入中國後在地化的問題意識，不如說是以柯倫泰的小說為一種媒介，宣揚共產主義才是女性未來的最佳選擇；而胡的創作與其說是一種中篇小說的形式，不如說是以小說形式做為一種手段的意識形態宣傳品。柯氏的〈三代之愛〉儘管在每一位人物身上皆已被作者「政治標籤化」，但由於這些「標籤」在此小說之前已有諸多十九世紀俄羅斯名家與名著共同創造出人物的典型，因此站在承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藝遺產的基礎上，柯氏創作只需輕描淡寫，即具畫龍點睛之效。然而，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雖然也對人物貼上「政治標籤」，但刻劃的皆為當代人物，敘述中不僅缺乏代際問題的社會討論，又強加政治立場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例如，小說刻劃的國民黨黨員皆如同向資本主義靠攏的豬鬃，終日雪茄紅酒，腦滿腸肥，而共產黨黨員盡一清如水，充滿理想。三民主義下的女同志追求性解放革命，都成了男性的性玩物，而同情左翼者，就成了追求兩性平等的新女性典型。小說中呈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以最終的「到莫斯科去」做為結局便前途一切光明，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如此兩極化、簡單化，既缺乏傳統文藝遺產深度的支持，且又未能即時創造出當代典型，當然無法如柯倫泰的小說，甚至是後來如丁玲創作《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 一般，廣獲大眾的青睞和注意。

值得探究的是，胡也頻將柯倫泰小說對蘇聯新生活、新女性與新世代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毫無疑問地轉嫁為中國青年參照蘇聯兩性藍圖而對未來生活產生的一種憧憬和信仰，並直接將柯氏核心疑慮等同於小說稱頌之創作要旨。胡也頻繼而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的短篇小說〈同居〉中，進一步闡揚他吸收柯倫泰思想中所謂「兩性平等」理念，而將其內容的時空設定在解放後的未來家庭生活。接收柯氏在〈家庭與共產政府〉中所提，胡也頻亦在小說中以其想像編織未來的中國蘇維埃社會裏，平等的兩性，特別是女性，將不再需要另一半的同意而可逕自離婚。當中情節的開展就奠基於此原則之下，以全知的第三人稱敘述者描述男性農民王大寶如何從無法接受這樣的婚姻制度，到蘇維埃委員會處要求鄭委員長賠償，以及鄭如何安撫和安排，而使男主角以為下個月即可得到另一位「愛人」，所以歡天喜地離去。果不出其然，這篇景仰蘇維埃生活而虛設未來的短篇小說，如同〈到莫斯科去〉的結局一樣光明。在蘇維埃制度下不出一個月，作者讓農民王大寶再娶，比起傳統社會中才子佳人的在水一方更直搗黃龍，從無崎嶇，自此

幸福快樂。上述如此快樂結局 (happy endings)，又豈非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左翼青年作家對人生與社會抱持著天真爛漫之美夢，卻在理想與實踐中永遠無法得到平衡與相互印證的結果？

綜上觀之，原作〈三代之愛〉與進入中國在地化後創作而成的〈到莫斯科去〉相較之下後，可清楚得出以下幾個結論。首先，初出茅廬的男性青年作家胡也頻，在其作品中不但缺乏柯倫泰多年身處政壇所練就一身極佳的政治口才與老練語言，無法成功地以一文建立起作家與讀者、男性與女性，甚至是代際之間「我們」集體、群體和共同體的認同，甚至在各項文藝遺產的繼承與革新中難以望柯倫泰之項背；在看似坦白直率的白話裏暗藏機心，在平鋪直述中創造爭議。胡的作品既無法俄羅斯化與蘇聯化，為傳統現實主義或其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開疆闢土，又難以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學以創新，可謂既看不見社會問題，更無以抒情，最終只能淪為政治洪／紅流下的宣傳品。再者，較之柯倫泰意欲創建以女體為先與女權平等的政體等政治與文藝野心，胡也頻在其作品中既無法開展性別問題，又難以凸顯性別差異，故從全球化到在地化的創作過程中，急遽地縮小原作的視野、洞見和前衛性，又不具備草根性的語言力量，故僅可被視為是未經世事的知識青年滿懷天真與一廂情願的想像之作。最後，胡也頻在其人生道路與命運開展的過程中，遠遠不如年青時代就周遊列國的，甚至在沙皇與蘇維埃政治高層中洗鍊多年，兼具美貌與智慧的柯倫泰來得精彩。因此，〈到莫斯科去〉就在身分、性別與文化的各種差異中，僅可被視為〈三代之愛〉全球化後中國在地化的一小部分，無法在互文中另展洪圖，擴張全球，遠遠無法超越原作，捲起革命千堆雪。

## 六、結論

從柯倫泰的〈三代之愛〉在蘇聯的生成、傳播和接受來看，可以清楚得見柯氏所處的外在政治發展，以及內心各種角色扮演的矛盾與角力；不僅是列寧過去的好友和現在的政敵，又兼具共產黨的政治家、外交家、馬克思女性主義者等多重身分，接著又執筆成為小說作家，以文藝為手腕為其即將殞落的政治生涯再創高峰。這些身分與背景當中的矛盾、角力和張力，成就了〈三代之愛〉一文，平鋪直述的白話中，情節卻驚世駭俗。

由前述可知，柯倫泰創作〈三代之愛〉的動機如同其多重身分而顯得相當複

雜和多元。但不論究其政治或者文學方面而言，她的視野觸角所及，遠遠不僅止於關注如何呈現革命後新時代的社會問題意識，更在意對十九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遺產的掌握與承繼。她的野心不在於只挑戰傳統父權與資本主義結合的政權而已，更是著眼於如何建立起共產主義下新興勞動階級的性道德，而這一性道德的論述中絕不能再重蹈女性自覺與女體自主缺席的覆轍。我們甚至看到文中更進一步的暗示，做為新時代議題與先鋒的新女性不應只是男性領導的愛慕者而已，或許更該對男性權威與威權報以「微笑」，反客為主。

〈三代之愛〉依序進入日本和中國後，這一文本卻成為兩國失敗的共產革命的救命仙丹。柯倫泰呈現的蘇聯新女性問題、全世界婦女的社會與政治意識，以及新性道德等議題，在中、日兩國共黨中央的父權家長紛紛失勢、權力真空之際，反轉成為地下宣傳的前衛，幫助潰敗的共產黨吸引了更多的年輕男女。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在跨文化旅行之後，原先內外的各種矛盾和角力都顯得不再重要，在異國開啓了新的生命，進一步創造或引發了許多中、日知識分子在這些議題上的在地化文藝創作，在公共空間裏開展自我探索的文學實驗。不論這些新生命是否稚嫩、是否早夭，抑或是否茁壯發展，無可否認的是，進入日本與中國後更為人關注的，在於此一文本是否能在女性解放運動與思潮的全球化發展蓬勃之際，開展出一條先鋒道路，是其它國家與作家未曾得見，也不敢公開面對的問題意識。

最後，〈三代之愛〉在蘇聯並未引起太多男女性別意識的論爭，進入日本和中國後，卻讓紅男綠女紛紛選邊開啓論戰。有趣的是日本與中國的不少男性，如本論所見之林房雄和胡也頻，他們雖然各自有各自背後的私人原因，但都是屬於全面支持和肯定柯倫泰的類型。〈三代之愛〉曾讓早期蘇聯婦女在共產革命下得到短暫的婚姻、愛情和性的解放，亦曾促使早期蘇聯社會相信女性權力之普遍擴張並不損及，甚至可以兼顧男性權力的一種兩性平等的崇高理想。但自一九三〇年史達林宣稱蘇聯沒有所謂的「性別差異」問題之後發展就嘎然而止，會生孩子，「齊家治國，一肩雙挑」的「英雄母親」(мать-героиня) 成為史達林主義下的新楷模，直至蘇聯解體。

然而〈三代之愛〉進入日本和中國後，雖在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中引發社會探討女性解放與兩性平等的熱潮，但問題更多並非出於女性的婚姻、愛情和性的解放本身，而是面對脫離父權傳統而不負責任的新男性，女性必須肩負家事、教育和工作，一根蠟燭兩頭燒。關於這一點，早已在不少中、日左翼女作家的生

平經歷與創作中清楚體現。於是〈三代之愛〉讓這三國女性在未得到婚姻、愛情和性的解放之前，卻先獲得了繁重的工作；在尚未全面挖掘自我意識與女體為先的個人主義之前，先邁入了集體主義。是故吾人不禁要問：〈三代之愛〉在亞洲的文化中，最終究竟嘉惠了男性，還是它原本設定的目標——女性？

# 嫻嫻、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

## ——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 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

陳相因

本文主要聚焦於柯倫泰的短篇小說〈三代之愛〉，並以此例說明早期共黨革命一種具備全球化與在地化性質的「戀愛加革命」文學典範與女性類型。論文的第一部份分析柯氏如何因個人所處之政治情勢，寄情創作並經由其寫作意圖、技巧、策略，將其政治理念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藝遺產結合，引導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甚至是俄國十月革命過後的無產階級，共同關注與重視女性問題。柯倫泰並以作家的身份向東亞與世界各國傳播她的性別政策，意欲建構起一個兩性對等、權力／利共享的勞動王國。

然而，〈三代之愛〉依序進入日本和中國後，在原來文本中呈現的蘇聯新女性問題、新時代婦女具備的社會與政治意識，以及建構新性道德等議題內的各種矛盾和角力都顯得不再重要，從而反轉成為前衛的地下宣傳文學，幫助日本與中國共產黨吸收更多的年輕男女，在困難的政治絕境中獻身革命，並且對日本與中國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的文壇和文學發展皆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即針對此影響、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等層面展開中、日、俄三方的史料考證，以及政治、文學與性別等問題辯證。

關鍵詞：嫻嫻 〈三代之愛〉 柯倫泰 胡也頻 共產革命文學

## Polyamory and Love in Early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Experiments and Transcultural Practices of Kollontai's "Love of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Japan and China

CHEN Hsiang-yin Sash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Love of Three Generations," one of the best-known short stories by the Russian writer Alexandra Kollontai (1872-1952), was received in the Soviet Union, Japan, and China.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shows how Kollontai shifted her occupation from politician to writer after she met with heavy setbacks in both her political career and her marriage. As a result of these experiences, Kollontai was motivated to write on the theme of the new woman with a new sexual morality. Her writings on women's problems, which fused socialist ideals with 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tradition, intended to attract not only the falling bourgeoisie, but also the rising proletariat. She also made her gender policies known to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n ideal kingdom of labour marked by power sharing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yet, after "Love of Three Generations" wa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and Chinese, its message underwent a profound change. Women's problems and the attempt to establish gender equality were no longer at the forefront. Instead, at a time when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both countries were on the verge of being eradicated by the authorities, the story was turned into underground literature designed to persuade more youth and women to take part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stor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Japanese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time, as can be seen in the works of specific individual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considers this influence and shows the transcultural practices inspired by Kollontai's writ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Japan, and China.

**Keywords:** polyamory "Love of Three Generations" Kollontai Hu Yepin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 徵引書目

- 巴金：《俄羅斯十女傑》，《巴金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 古米列夫斯基著，周起應、立波譯：《大學生私生活》，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
- 吳佩珍：〈女性解放與戀愛至上主義之間：柯倫泰的接受與日本大正、昭和期思潮變遷〉，「『赤』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二十世紀蘇聯與東亞的左翼文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所主辦，2014年6月5-6日。
- 李今：《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李輝：《沈從文與丁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克·蔡特金著，馬清槐譯：《列寧印象記》，北京：三聯書店，1954年。
- 阿格涅夫著，林語堂，張友松合譯：《新俄學生日記》，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
- \_\_\_\_\_，查士驥譯：《蘇俄中學生日記》，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
- 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新女性》第3卷第9號，1928年，頁1033-1051。
- 林瓊華：〈從遺忘到再現：謝雪紅的歷史在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台灣史學雜誌》第15期，2013年12月，頁33-72。
- 柯倫泰著，沈端先、汪馥泉譯：《戀愛與新道德》，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
- \_\_\_\_\_，楊驪譯：《赤戀》，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
- \_\_\_\_\_，溫生民譯：《赤戀》，上海：啓智書局，1929年。
- \_\_\_\_\_：《戀愛之道》，上海：啓智書局，1929年。
- \_\_\_\_\_，李蘭譯：《偉大的戀愛》，上海：現代書局，1930年。
- \_\_\_\_\_，沈茲九、羅瓊合譯：《新婦女論》，北京：三聯書店，1951年。
- \_\_\_\_\_，葉林、段爲譯：《工人反對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 \_\_\_\_\_，楊媚月譯：《新婦女論》，香港：新苗出版社，1994年。
- 哥倫泰著，過立先編譯：《赤戀》，上海：開華書局，1934年。
- 施建偉編：《胡也頻代表作》，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耶娃·蕭（葉華）：《世紀之戀——我與蕭三》，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
- 胡也頻：《胡也頻選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馬拉施金著，楊驪譯：《異樣的戀》，《現代文學》第1卷第3、4、6期，1930年。
- 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研究所，2010年。
- 陳相因：〈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9期，2011年12月，頁1-31。
- \_\_\_\_\_：〈嫵嫩、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I)：一杯水主義的誤解、誤讀與誤用〉，「左翼文學工作坊：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2012年10月29日。
- \_\_\_\_\_：〈「自我」的符碼與戲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中

-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集刊》第44期，2014年3月，頁79-142。
- \_\_\_\_\_：〈嫵嫵、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1927-1936)〉，《字花》第61期，2016年6月，頁114-117。
- 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年。
- 高群逸枝著，芳子譯：〈排官僚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9期，1928年，頁1033-1058。
- 馮玉祥：《我的生活》，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
- 楊翠：《永不放棄：楊達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臺北：蔚藍文化，2016年。
- 劉家泉：《宋慶齡流亡海外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魯迅：《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1997年。
- アレクサンドラ・コロンタイ著，林房雄譯：《戀愛の道》，東京：世界社，1928年。
- コロンタイ女史著，松尾四郎譯：《赤い戀》，東京：世界社，1927年。
- 山川菊榮：〈アレクサンドラ・コロンタイ女史〉，《女性》，1924年10月號，頁290-291。
- 平林たい子：《平林たい子全集》，東京：潮出版社，1976-1979年。
- \_\_\_\_\_：《砂漠の花》，收入《平林たい子全集》第7卷，東京：潮出版社，1976-1979年。
- 立花隆：《日本共產黨の研究（一）》，東京：講談社，1983年。
- 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東京：新樹社，2001年。
- 秋山洋子：〈コロンタイの戀愛論の中國への紹介をめぐって〉，《駿河台大學論叢》第40號，2010年7月，頁71-90。
- Clements, Barbara.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hen, Hsiang-Yin Sasha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ransmitting and Translating Kollontai in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May Fourth China." In *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Others (1829-2010)*. Edited by James St. André, Peng Hsiao-ye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Deutsch, Helene.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44.
- Epstein, Israel. *Woman in World History: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5.
- Farnsworth, Beatrice.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Jacobs, Dan N.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ollontai, Alexandra. *Love of Worker Bees*. Translated by Cathy Porter.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2004.
- Leyda, Si-lan Chen. *Footnote to History*. New York: Dance Horizons, 1984.
- Porter, Cathy. *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Pontypool: Merlin Press, 2013.

- Scalapino, Robert A.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Trotsky, Leo. *Stali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1941.
- Бреслав, Е.И. *А.М. Коллонтай*. М.: Мысль, 1974.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1920-1925.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и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минар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1994.
- 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Письмо к трудя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3 (май 1923), С. 111-124.
- \_\_\_\_\_. *Из моей жизни и работ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дневники*.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4.
- \_\_\_\_\_. *Революция-великая мятежница: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1901-1952*.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9.
- \_\_\_\_\_.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1922-1940*. М.: Academia, 2001.
- \_\_\_\_\_. *Летопись моей жизни*. М.: Academia, 2004.
- \_\_\_\_\_.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Пб.: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 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 М.: Гос. изд-во худож. лит., 1955-1961.
- Олесин, Михаил. *Первая в мир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 Папакин, Г.В. *От марта до сентября*.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Украины, 1990.
- Чехов, А. П.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омах*. М.: Наука, 1977.
- Шейнио З. *Путь к вершине: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А.М. Коллонтай*. М.: Сов. Россия, 1987.
- Шумрикова, Л.П.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Женщина и политик*. Махачкала: ДГУ, 1992.

